

端方令江苏学会会同上海道台瑞澂核议择地建校,瑞澂非常重视,认为:“此事关系极巨,非有熟悉学务之员筹议难期妥善,以张季直殿撰及郑京卿熟悉教育而且学问渊博,故于目前将如何择地建校如何集资创设情形咨商核议矣。”^[14]在端方的支持和资助下,中国公学自1907年春,每年得到官府常款12000两,其他省份开明官僚、商界、学界等也有部分助款,再加上中国公学自行筹款,基本解决了学校资金困难情况,中国公学有了一定的经费来源。

二、异见之纷争

中国公学的创办得到不同社会力量的共同支持绝非偶然,而是由时代的特殊性所决定。清末新政时期,教育改革是新政的重要内容,出国留学成为发展新式教育的主流之一,新式知识分子人数在此期间大增。他们所受的新式教育使他们具有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独立性,他们力图摒弃传统社会,却又没有在萌芽状态的新社会里找到自己应有的位置。这是一个不受任何约束的知识分子群体,他们易于接受任何的反叛思想,是所有改革和革命的后备力量。^[15]恰逢此时,日本颁布《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》,为他们进行政治活动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契机。然而,因他们对资本主义认识的不同,又形成政见不同的派别。在革命派看来,实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,推翻清政府专制统治是最好的时代选择;而立宪派同样看到封建专制的腐败,指出清政府:“以国民之膏脂供官吏之衣食,以国家之财政为大臣之利额,君主既无独鉴之明,国会又无监督之力,哀哀小民,莫可谁何,专制之毒,真如蛇蝎。”^[16]立宪派对封建专制统治表现出的反感,与革命党人相比并不逊色,只是从行动上并不如革命派激进。从这一点上分析,革命者与立宪派的分分合合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
而端方不同,尽管作为地方长官为中国公学的创立做出了极大的努力,但是革命是他最大的担忧。其实,端方在此之前任湘抚时,华兴会革命党人宁调元与其他同志就计划暗杀过端方。1906年,端方曾派人赴日侦查留日学生革命活动,在有关密札中,端方称:“中国留学日本文武学生,人数甚众,专志向学者固不乏人,而血气未定,惑于邪说,投入孙文逆党,倡为革命排满之举,亦属不少,若不调查明确,无以别良莠而弭隐患。”“中国学生,为孙文逆党所诱同谋作乱者,共有若干,派何执事,如何

运动?此外,有无主张革命邪说而并非孙文同党者,务得详细情形随时据实密禀,以凭核办。此事关系重要,务须格外慎密,勿得稍有泄漏。”^[17]同时,他还发布命令、密电,严防孙中山购运军火发动江浙一带的起义,缉拿革命党人,派人前往香港侦探孙中山活动等等。在对中国公学拨款确定后不久,端方明确提出由四品京堂郑孝胥为中国公学监督,主持学校一切事务。

上述政见的矛盾和冲突从中国公学开始创办时就有所表现。中国公学建立“仅及十日”,即发生了江苏学生退学风潮。按照郑孝胥的解释,这次退学事件是因为中国公学副干事的朱剑在会中口出一言,学生以此为借口认为中国公学排斥江苏籍学生。其实,对于本次风潮的内幕,郑孝胥是十分清楚的,但是郑孝胥对于此事本末“秘不宣布”,认为是因省界分歧而起,仅仅公开为“此事风潮最足以单简之词刺人脑筋者,中国公学排斥江苏人之一言耳”^[18]。虽经校方多次解释,并对朱剑批评,朱剑自行辞职,另公举张邦杰继任,但是江苏籍学生执意退学,退学者50余人^[19],另外成立健行公学。此次风潮对于中国公学影响颇大。然而,风潮起后,江苏籍学生登报之举扩大了事态,这使得社会人士对公学态度多少有些影响。其实,发起退学的高旭、朱少屏乃同盟会会员,高旭为同盟会江苏分会会长。这次风潮退学的真正目的并非排斥中国公学,而是要进行革命。健行公学成立后,高旭、朱少屏等人秘密进行革命活动,他们以《黄帝魂》、《法国革命史》为教材,秘密发行《民报》、创办《复报》,宣传革命,影响青年,发展同盟会会员。其校歌隐含着革命意义:“祖国主任在吾侪,千钧系一发;祖国主任在吾侪,万众射一的。策杖可追红日远,衔石可填碧海宽;自强不息天行健,勉旃新少年。”^[20]该校发展成为同盟会江苏分会的外围组织。健行公学的革命活动很快引起了两江总督端方的注意,端方下令立即查禁报刊,逮捕高旭、朱少屏等人。健行公学只得于1907年末被迫解散。^③

另一学生风潮发生在1907年,缓和与激进的态度差异再次表现出来。中国公学初办时,仿照同盟会体制实行民主共和,同学是创办人,职员也由同学选举出来,并对全体学生负责,学校的组织分为执行和评议两大部。^④但是,因为办学各方面的实际困难,这种制度并未执行下去。三干事张邦杰、王敬芳和黄兆祥,既要在外到处募捐,又要担负维持